

朝鲜战争与东北亚格局

祝曙光

(苏州科技学院 人文学院, 江苏 苏州 215009)

摘要: 由于美国认知上的误区, 导致朝鲜战争由国内战争演变为国际战争, 交战双方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朝鲜战争充分展示了交战双方的政策底线和斗争意志, 对中美关系、朝韩关系、日韩关系乃至整个东北亚格局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朝鲜战争; 中国; 美国; 苏联; 日本

中图分类号: K15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0246 (2010) 10-0009-07

60年前发生的朝鲜战争是冷战中第一场特殊的局部热战, 历时3年, 人员、物资损失巨大, 对中美关系、朝韩关系、日韩关系乃至整个东北亚格局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1 朝鲜战争首先影响到中国和美国的关系, 这场战争实际上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最大的发达国家之间的一场战争。中国内战爆发后, 美国一直扶持国民党政府, 向其提供大量的军事援助和财政援助, 把美国在东亚的利益与国民党政府捆绑在一起, 可是在国民党政府面临深重危机、美国有可能失去中国时, 美国政府却无意出兵干涉, 听任国民党政权崩溃。而朝鲜战争爆发后, 本来不在美国西太平洋防卫圈中的朝鲜半岛却引起了美国的高度重视, 迅速进行军事干预, 结果引发了中美之间的直接军事对抗。参与策划朝鲜战争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将军在回忆录中说了一段世人皆知的话: “我们在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间、同错误的对手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话中之意就是中美两国本来可以避免这场战争的。由于美国认知上的误区, 导致了朝鲜战争由国内战争演变为国际战争, 交战双方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美国并不是一个东亚国家, 但美国从没有放弃它对东亚的利益追求。美国决策层早在19世纪末就提出了它的东亚政策——门户开放政策。与美国在拉美推行的“门罗主义”相比, 门户开放政策是一个弹性和伸缩性较大的政策。为了维持门户开放政策, 美国不是凭借一己之力, 而是倾向于借助东亚国家来反对或压制东亚国家。美国历史学家约翰·道尔曾言, 美国人在某一个时间所怨恨的亚洲国家倾向于一个。中国、美国和日本之间的三边关系似乎证实了这一点。这种关系常常像一条三条腿的凳子。美国试图在亚洲保持一种平衡以确保中国和日本这两条腿都不至于太高因而破坏凳子的平衡, 当中国或日本威胁到将会搅乱它所认为的适当平衡时, 美国就会着手削短一条腿或者提升另一条腿。这在20世纪40年代和70年代导致了两次戏剧性的政策逆转。¹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美国与中国结盟共同抵抗日本, 中美关系极为密切, 以至于当抗战结束、国共两党矛盾尖锐化时, 美国国务卿马歇尔还亲自来华调停。战时来到中国的美国年轻外交官们, 如谢伟思 (John S. Service)、戴维斯 (John P. Davis)、范宣德 (John. Carter. Vincent) 等人对中共充满了好感, 认为腐败专制的国民党政权难以指望, 而中共却生气勃勃, 特别是当他们看到了延安的新民主主义体制的成功尝试, 发现中共与苏联几乎没有多少联系之后, 自然而然将抵制苏联向东亚扩张的

作者简介: 祝曙光, 苏州科技学院人文学院院长, 教授, 研究方向: 东北亚国际关系史和日本史。

¹ 任晓、胡泳浩等:《中美日三边关系》,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2年, 第90-91页。

希望，寄托到加强美国与中共关系的前景上来，他们大声疾呼：“把共产党人拉到我们一边而不是把他们投入俄国人的怀抱”。美国人不相信延安窑洞里会产生正统的马克思主义。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罗斯福委托特使居里（Lauchlin Currie）和联邦准备银行调查统计部主任戴普莱（Despres）向蒋介石转达了他的口信：“予自万里之外观察中国之共产党员，似与我等所称之社会党员，无甚差别。彼等对于农民、妇女以及日本之态度，足值吾人之赞许。故中国共产党与国民政府相类者多，相异者少。”戴普莱对此更进一步解释称：“罗斯福之意见以为中国之有共产党，并不能认为中国有共产主义之实行，只能视作民主政治之实习。”谢伟思在报告中兴奋地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将不会违反美国在中国的利益，共产党应该尽可能受到我们的同情和友好对待。”戴维斯更是直截了当地说：中共只是号称信奉马克思主义罢了，他们其实与英国工党领袖麦克唐纳一样，不过是一些主张渐进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中国共产主义的圣徒和先知们住在黄土坡挖出的窑洞里，过着俭朴的生活，幻想着奇怪的阶级妥协和政党联合之神降临，面带着羞色地拜倒在外国投资的金铢之下，并且渴望自己能按世界标准受到尊重。”¹因此从美国总统到普通外交官们，根据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未来发展前景的判断，作出了加强与中共联系来抗拒苏联的想法。美国决策者认为：“毛泽东与那些他最亲近的人都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

日本人也有类似的想法。1954年，日本外务省整理了一份《吉田首相外游资料》对中共关系进行了全面分析，尽管中国在苏联的支援下已经与美国在朝鲜半岛发生了直接的军事对抗，日本外务省仍然认为：“中苏关系并不密切。苏联曾向国民政府要求对满洲、新疆、外蒙的主权，苏联也会同样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同样的要求，中共从建党阶段开始就没有接受过苏联的任何积极的武力援助。苏联给中共的唯一间接援助是出兵东北的苏联红军把缴获的日本关东军的武器给了共产党（但是，当时苏联为了获得国民政府支持其占领北海道，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的正统政府，并与国民政府缔结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国民政府败走广州时，仍然让其大使馆跟随到广州）。后来，在朝鲜战争中也并没有情报证实苏联给予中共大量的武器援助。”“毛泽东是个人野心家，他决不会在苏联人面前低着头做人，他必定要与苏联人争取‘平等’地位。这是中共自身力量的问题，即中共的经济实力达到与苏联平起平坐之时就是中共脱离苏联之时。”²

朝鲜战争前美国从未放弃与中共政权接触的政策。在国共内战后期美国实际上已决心抛弃蒋介石政权，寻求与中共政权建立密切的关系。1948年3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6文件指出，对华长期目标“是推动建立一个稳定的代议制政府，以领导一个独立和统一的、对美友好的、并能够作为有效防止苏联在远东侵略的中国”。1948年9月7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主任凯南提出了全面转变对华政策的文件——《重新审查和制定美国对华政策》，指出：中国目前局势的产生是其内部因素使然。如果全面支持蒋介石，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都要付出难以承受的巨大代价，美国不应该以自己的信誉和资源去赌博。国际调停也无济于事。由于民族主义力量的作用，中共内部会出现“铁托主义”倾向，中共可能同南斯拉夫一样对待苏联。因此，美国的政策应该是“尽可能防止中国变成苏联这个政治、军事大国的附庸”³。当美国从朝鲜半岛南部撤军后，杜鲁门总统向国会提出了向韩国、伊朗、希腊、土耳其等国提供3亿美元的援助案。为此杜鲁门受到了共和党议员们的反对，他们认为中国与韩国一样，同样是亚洲民主主义的象征，但杜鲁门政府没有为制止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而做出过什么。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回答共和党议员的提问时称，对国民党政府实行军事援助不切实际，也不一定有效。⁴艾奇逊曾在1949年2月就中国局势发表评论说：“森林里一棵大树倒下，

¹ 杨奎松主编：《冷战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2—16页。

² 廉德瑰：《美国与中日关系的演变》，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第113—114页。

³ 崔丕：《美国冷战战略与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国委员会（1945—1994）》，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90—191页。

⁴ 金景一：《浅论朝鲜战争前美国关于援韩与援蒋的争论》，载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编《韩国研究论丛》第20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

需等尘埃落定，才能看清其造成的后果。”为了表示对新中国的友好，艾奇逊还表示中国台湾和朝鲜不在美国的西太平洋防卫圈内。

中国共产党人也不是一开始就敌视美国的。早在 1940 年，即国共合作时期，周恩来曾经对马歇尔说：“从意识形态上说，我们当然要采取接近苏联的政策，但是接近的程度要取决于你们。”1949 年 4 月，毛泽东在一份内部电报中指出：“如果美国及英国能断绝和国民党政府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¹但是世界范围内的冷战局面已逐渐形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及冲突越来越激烈，在这种形势下美国没有放弃扶蒋抑共的政策，迫使中共在外交上对苏“一边倒”。1949 年 12 月毛泽东的莫斯科之行以及《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使美国拉拢共产党中国的企图遭遇了严重挫折。中苏结盟标志着社会主义阵营在欧亚大陆连成一片，冷战已从欧洲延伸到亚洲东部。

2 1945 年 8 月 9 日，苏联军队向朝鲜半岛北部发动进攻，推进非常迅速，并越过“三八线”，当美军抵达朝鲜后，按照美苏两国达成的协议，苏军立即撤离到“三八线”以北。朝鲜出现了两个性质不同、完全对立的政权。当美苏军队撤出朝鲜半岛后，南北两个政权为了谋求国家统一，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当不能以和平方式统一国家时，行使武力就成为唯一的选择。从 1948 年开始，朝鲜南北双方开始发生武装冲突，从局部性的、间断性的冲突发展为全局性的、经常性的武装冲突，到 1949 年夏天，双方卷入军事冲突（包括海上军事冲突）的人员达数千人，其中数百人死亡，最终导致了内战的全面爆发。²

朝鲜半岛北方对南方的攻击，得到了苏联的支持。中国革命的胜利给了苏联极大的鼓舞，以为可以在朝鲜复制中国革命，而且不会遭遇美国的军事干预，因为美国就没有直接用武力干预中国内战。“斯大林及其顾问得出了也许是相当有理性的结论：美国并不关心朝鲜内战的后果。斯大林曾要求中国共产党人谨慎行事，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战心怀恐惧。中国人没理他的茬，他的担心也未变成现实。与中国相比，朝鲜对美国就更不重要了，美国干预的威胁几乎已消耗殆尽。”³

中苏结盟以后，美国的亚太战略发生了很大变化，把中国台湾和朝鲜作为遏止共产主义势力的重要阵地。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认定，这场战争是由“苏联发动、支持和怂恿的，非用武力不能加以制止。如果朝鲜军队担当不了这个任务——这点看来十分可能——只有美国军事干预才能做到”；“这是一次公开的、赤裸裸地对我们国际公认的朝鲜保护者的地位的挑战”，“回避这一挑战，将使美国在台湾、日本、东南亚、西欧乃至西德的威信受到极大损害”。⁴原本被认为无足轻重的朝鲜半岛，突然间成为美国必须承担防务义务的最重要地区之一。1950 年 7 月 1 日美军地面部队在釜山登陆，9 月 25 日，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并迅速向“三八线”以北推进，把战火烧向中朝边境。本来美军可以停留在“三八线”附近，见好就收，但美国政府“向任何胜利者都要面对的最危险的诱惑之一——扩大战争目标的诱惑——低下了头”。

面对斯大林和朝鲜劳动党要求中国出兵援助朝鲜革命的请求，中国共产党决策层克服新中国建立才一年、百废待兴的困难处境，毅然决定出兵朝鲜，使朝鲜内战演变为中美两国的直接军事对抗。

美国出兵朝鲜的前提是中国不会对朝鲜实施军事干预或即使进行军事干预，美国也能轻易加以应对，参与朝鲜战争的成本是有限的、美国能够承受的。美国决策层的这一认识有它的逻辑道理。按照美国决策层的思维定式，中国是一个弱国，“它的一些地区自 1931 年以来就一直战乱不断，它急需时间和所有的资源用于重建，然后使这个国家现代化。它几乎不能指望能赢得一场反对世人曾经知道的

¹ 《毛泽东文集》第 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285 页。

² Ç Ö . μ ε μ — Á j N 对北朝鲜、韩国战略—脅威論を おもる 外交政策 栗原泉、豊田英子訳、東京：明石書店、2004、37 頁。

³ 孔华润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年，第 286 页。

⁴ 崔丕：《美国冷战战略与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国委员会（1945—1994）》，北京：中华书局，2005 年，第 228 页。

最强大国家的战争”¹。正如美国决策者所预料的那样，中国领导人确实不希望打仗。聂荣臻元帅回忆说，党内一些人对出兵援朝有顾虑，认为“我们打了这么多年仗，迫切需要休养生息，建国才一年，困难重重，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²。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曾起草了一份致斯大林的电报，表示：“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³但领导层对出兵朝鲜有不同意见，使得这份电报没有发出去。

但是美国决策者低估了中国领导人捍卫国家主权和边境安全的决心和意志。根据历史经验，中国领导人认为，美国侵略朝鲜的目的是为了将来侵略中国，即便美国打到鸭绿江边为止对中国也是不利的，因为中国东北重要的工业基地将暴露在美国的直接威胁下，使中国无法安心进行经济建设，增加中国边境防御的成本。10月24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上的报告中指出：“中朝是唇齿之邦，唇亡则齿寒。朝鲜如果被美帝国主义压倒，我国东北就无法安定。我国的重工业半数在东北，东北的工业半数在南部，都在敌人轰炸威胁的范围之内。从八月二十七日到昨天这两个月间，美帝国主义的飞机已侵入我国十二次。最近不仅在鸭绿江，而且已飞到宽甸来示威、侦察、扫射和轰炸。如果美帝打到鸭绿江边，我们怎么能安心生产？”“鸭绿江一千多里的防线，需要多少部队！而且年复一年，不知它哪一天打进来。这样下去怎么能安心生产建设？况且敌人如果将朝鲜侵占了，也不会就此罢手。所以，从朝鲜在东方的地位和前途的展望来说，我们不能不援助；从唇齿相依的关系来说，我们也不能不援助。这是敌人把火烧到了我们的大门口，并非我们惹火烧身。”⁴毛泽东认为出兵参战是必要的，“因为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志愿军入朝参战，“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⁵。

中国为了避免与美国的直接军事对抗，曾发出了明确的警告。周恩来总理通过印度驻华大使转告美国人，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不会“坐视不顾，我们要管”。但是美国没有认真对待中国人的警告，将周恩来的谈话低估为恐吓，认为中国人绝对不敢冒与美国人打仗的风险。麦克阿瑟向杜鲁门保证，美国已赢得了朝鲜战争的胜利，中国或苏联干预的可能性极小，“要是他们在头一两个月内进行了干涉，那倒是有可能决定战局的。我们现在不再担心他们干涉了。我们无须毕恭毕敬地站着不动”。“如果中国人试图攻下平壤，那一定会遭到最大的伤亡”。麦克阿瑟对获得战争的胜利充满了信心，“由于我们的基本上无敌的空军具有随时可以摧毁鸭绿江南北的进攻基地和补给线的潜在威力，所以我本人的军事上的估计是，没有任何一个中国军事指挥官会冒这样的风险把大量兵力投入已被破坏殆尽的朝鲜半岛。这样，他们要冒的由于给养短缺而毁灭的风险就太大了。”⁶但是中国克服重重困难，毅然出兵朝鲜，使朝鲜战局发生了迅速变化，极大地消耗了美国的财富和军事力量，美国政府“继续进行的战争已经得不到美国人民的支持”，“它为自己弄出了一场如果不冒世界战争的风险就不能取胜的战争，而美国军方还没有为世界战争做好准备”，⁷为此杜鲁门解除了企图扩大朝鲜战争的麦克阿瑟的职务。

¹ 孔华润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291页。

² 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下，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第735页。

³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06页。

⁴ 《周恩来选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1页。

⁵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17页。

⁶ 玛格丽特·杜鲁门：《哈里·杜鲁门》，南京大学历史系近现代英美对外关系研究室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6年，第227-228页；《麦克阿瑟回忆录》，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翻译组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265页。

⁷ 孔华润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292页。

朝鲜战争极大地震惊了美国人。为什么一场朝鲜内战却演变为中美之间的战争，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美之间的直接军事对抗？美国著名东亚问题专家费正清指出：“1945年日本战败后，我们拒不承认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内战中的胜利。1950年6月，我们在联合国的旗子下，为保卫南朝鲜反对北朝鲜的侵略而进行了侵略。每次我们都认为自己是反对专横的自由保护者。然而朝鲜战争变成了中美战争，并且终于僵持不下。在1953年缔结了至今仍然有效的《朝鲜停战协定》后，我们在1954年同台湾结盟，并支持法国在印度支那的行动。从1960年起，我们给予南越以越来越多的援助，并从1965年起调遣50万大军对北越进行了干预。”现在任何美国有识之士想起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就会感到羞愧，“我们就必须设法了解在那里进行干涉的主要原因是什么”。“首先，从历史背景来看，我们不愿让一个敌对的强国主宰东亚，不管它是40年代军国主义日本，还是冷战时代所谓‘铁板一块’的国际共产主义。这种情绪也是19世纪英国情绪的回音，当时它作为海上贸易强国，反对俄国巨人在欧洲大陆的扩张。”“我们……认为新的中共独裁政权并不代表中国人民相当大的一部分人的利益，认为它只是靠武力和操纵手段才能维持下去。总之，我们认为它太坏，不能持久。根据欧洲在极权主义统治下的痛苦经验，这种冷战的意识形态立场似乎完全是合理的。”“奇怪的是，事实证明毛泽东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并不是扩张成性的。它把部队从朝鲜撤走，容忍国民党在金门设置的‘前线’，在1962年与印军作战只是为了维护边界的权利，而且并没有出兵干涉越南来反对我们。”费正清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也可能是我们并不真正理解我们同什么样的对象打交道？”“如果要在今天和平共处并继续生存下去，我们就必须设法重新理解亚洲的现实和我们自己的侵略性。”¹

朝鲜战争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维护了中国东北部边界的安全，拓展了中国的生存空间，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确保了朝鲜半岛乃至东北亚战略格局的长期稳定。朝鲜战争前，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朝鲜劳动党，都对中国的武装力量持怀疑态度。朝鲜战争爆发后，朝鲜领导人出于对形势的乐观估计，并不欢迎中国干预朝鲜战争，以至于周恩来总理在会见苏联大使和军事顾问时，抱怨对朝鲜的军事形势了解很少。作为朝鲜的近邻，在历史上中国一直对朝鲜有着深远的影响。但甲午战争使中国失去了对朝鲜的宗主权，而日本通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确立了对朝鲜的控制，“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战败而终结。从此，美国取代日本，成为俄国在朝鲜的野心的制约。中国通过干涉朝鲜战争恢复了它控制朝鲜的传统利益”²。“他们把北朝鲜的共产党政权作为他们的边界与南方敌对力量之间的缓冲保持了下来。”出兵朝鲜挽救了朝鲜革命，建立了中朝两国、两党的特殊友好关系。但是由于中国军队与韩国军队在战场上相互厮杀，中韩两国在谈判桌上相互指责与谩骂，使得中韩之间互相隔绝、彼此敌对与中朝之间互相支持、友好合作一起成为中国与朝鲜半岛国家关系的两道既彼此矛盾又无法截然分开的双重景观，“这也构成了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体制下中国与半岛关系的基本特征”³。

朝鲜战争对美国的亚太战略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国以中国为敌，采取遏制中国的政策。1951年1月4日，国务院顾问杜勒斯声称，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防务范围应该是日本——琉球群岛——台湾——菲律宾——澳大利亚这条近海岛屿链。这条防线显然超出了艾奇逊1950年1月提出的美国防务范围。美国通过《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澳新美太平洋安全保障条约》、《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以及《美韩共同防御条约》，确立了对亚洲大陆新月型的包围态势，派遣舰队进驻台湾海峡，造成中美之间长达20多年的相互隔绝状态以及至今尚未解决的台湾问题，中国取代了苏联，站在了亚洲冷战的最前沿。

¹ John King Fairban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Poston Harvard College, 1983, pp. 34-436. 转引自廉德瑰《美国与中日关系的演变》，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第277-278页。

² 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卢明华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第233-234页。

³ 陈峰君、王传剑：《亚太大国与朝鲜半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01页。

朝鲜战争期间,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现代战争没有经济做支撑是难以为继的,由此各行各业掀起了抗美援朝爱国运动,中国经济不仅受战争的影响很小,反而取得了巨大成就。

3

朝鲜战争虽然使朝鲜半岛的分裂固定化,但也使南北双方意识到用军事手段谋求半岛统一不仅风险大、成本高,而且根本行不通,周边大国不可能接受朝鲜半岛上一方吞并另一方的统一。美国就是在迫使李承晚放弃“武力统一”整个朝鲜半岛的基础上与韩国签订共同防御条约的。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新领导人希望尽快结束朝鲜战争。由此半岛局势逐渐稳定下来,双方开始了经济恢复和重建工作。早在战争稳定在“三八线”附近时,美国就向韩国派出了两个经济策划使团,帮助韩国制订了以农业和矿业作为比较优势、进行开发、创汇、进口工业品、扩大原材料出口为内容的五年计划,并设立了美国驻汉城的“经济协调官室”,监督美国的各项援韩计划。1950年,“马歇尔计划”登陆朝鲜。1954—1961年美国以无偿赠送形式援韩2亿美元,“韩国利用此项援助解决了同期70%的进口支付和80%的固定资产投入,它足足占了韩国国民生产总值的8%”¹。20世纪50年代韩国经济的恢复为60年代韩国经济的腾飞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加强了美国对韩国的控制,防止韩国领导人采取冒险性政策,把美国再次拖入战争。北朝鲜则开展了“千里马运动”。为了提高农业产量,重点投资化肥和机械生产,到20世纪70年代以仅占朝鲜半岛18%的耕地做到了粮食自给。20世纪60—70年代,北朝鲜经济实力已超过了韩国。”

朝鲜战争对日韩关系造成了重大影响。由于日本曾对朝鲜半岛进行了长达36年的殖民统治,使朝鲜民族在感情上疏远和仇视日本人,韩国境内弥漫着浓厚的反日氛围。1948年8月17日,即韩国政府成立的第三天,李承晚总统就提出了新政府的对日索赔政策。因此战后初期日韩两国产生了严重的对立,迟迟未就复交问题进行谈判。朝鲜半岛的战后史实际上是以“三八”线为界、由两个敌对政权进行统治并在1950年爆发了朝鲜战争的悲剧性的战后史。韩国人民把朝鲜半岛的悲剧性历史归结为日本的殖民统治所留下的后遗症是理所当然的。正是日本把朝鲜变为自己的殖民地,导致苏联在太平洋战争末期参加对日作战并进军朝鲜半岛,而美国为了阻止苏联占领整个朝鲜半岛,提出以“三八线”为界,由美国和苏联分别占领朝鲜南北方,造成朝鲜半岛事实上的分裂。

但是朝鲜战争的爆发使韩国经济遭受了重创,工业被毁达到60%,基础设施被毁达到50%。由于形势紧张,1951年1月,韩国政府迁都釜山,韩国的生存岌岌可危。为了防止韩国的共产主义化,振兴韩国经济,与日本关系正常化已成为韩国外交不可回避的问题。为此,韩国要求美国积极斡旋韩日会谈,促进韩日关系的发展。美国当然愿意它在东北亚的两个重要盟国加强合作。韩日关系的恶化不符合美国的东北亚战略。1951年1月,美国国务院顾问达勒斯在访问韩国时,就向李承晚表示,明确韩国对日讲和的根本方针,同时抛弃过去的感情,促进韩日两国间的友好关系,这对东亚邻国也是有利的。”在朝鲜战争趋于稳定的1951年10月,日韩双方进行了有关建交问题的预备会谈。1952年2月,日韩之间进行了正式会谈。尽管日韩会谈并不顺利,但出于共同的战略考虑,经过14年的谈判,两国终于在1965年6月22日签署了《日韩基本关系条约》及相关协定,恢复了关系正常化。

日本当然是朝鲜战争的获益者。以往学术界关注的是日本经济因朝鲜战争而复苏,却忽视了朝鲜战争使日本较快地摆脱被占领状态,恢复为主权国家。美国决策层早在二战结束前就已考虑将日本变成遏制苏联的力量,1945年5月美国海军部长福雷斯特即提出:“我们想要把日本打败到什么程度?彻底,彻底到什么程度?”“对苏联力量的增长,我们采取了什么样的政策?要不要有个能与之抗衡的力量,这个力量是中国还是日本?”²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政策经历了惩治、改造和主动结盟的

¹ 陈峰君、王传剑:《亚太大国与朝鲜半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7页。

² Ч.О.μ.ε.μ. — 『А.Д.Н.对北朝鲜、韩国战略—脅威論をある外交政策』栗原泉、豊田英子訳、東京:明石書店、2004、45—47頁。

³ 池明觀『日韓關係史研究』東京:新教出版社、1999、29頁。

⁴ 王少普、吴寄南:《战后日本防卫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9页。

过程。美国最初设想对日本实施 20 年的军事占领，以报复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但朝鲜战争为日本缩短外国军事占领、迅速恢复为主权国家提供了机会。1950 年 7 月 8 日，即朝鲜战争爆发后第 13 天，麦克阿瑟致信日本首相吉田茂，“为了维持国内秩序，守卫日本的海岸线、防止非法和秘密进入（日本）”，要求创设直属政府的国家警察预备队 75 000 人和给予海上保安厅增加 8000 人的权限。¹ 朝鲜战争期间，日本统治者动员技术人员和物资为美国的战争政策服务。日本战略价值的上升为其尽快获得媾和独立带来了有利条件，因为美国政府是媾和谈判的最重要对手。9 月 10 日，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确立了对日媾和的方针。9 月 14 日，杜鲁门发表了促进对日媾和的声明。11 月 24 日，美国发表了《关于对日媾和七原则》。² 朝鲜战争鏖战正酣的 1951 年 9 月 8 日，美国不顾苏联、中国等国的反对，强行与日本片面媾和，签订了《旧金山和约》，其后又与日本签订安全保障条约。可以说，朝鲜战争直接催生了美日同盟，美日关系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从势不两立发展到军事盟友。“在太平洋地域，朝鲜战争带来的最显著结果，就是（美国）对日政策的转换。”“大陆中国没有成为同盟国而是敌人，对美国领导人来说，日本的非武装化的魅力一下子减弱了。”“日本成为远东美军的中央仓库、猪排、运输的中心地。”³

综上所述，朝鲜战争充分展示了交战双方的政策底线和斗争意志，战争造成的损失使敌我双方都意识到战争成本的巨大和昂贵。特别是美国，在与中国人的战争中居然接连失利，损兵折将，迫使美国人重新思考自己的力量界限。美国学者埃弗拉指出：当征服变得容易时，会出现 11 种引起战争的因素，包括国家会更多地采取机会主义的扩张政策，会显得更为好战，使得错误变得更为危险；国家会采用更危险的外交策略，这些策略更有可能导致战争，国家在达成协议时的信任更少等。⁴ 当中国以坚强的意志投入朝鲜战争，使得朝鲜战争形成对峙和拉锯局面时，美国已意识到它不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国内的反战呼声日益高涨。早在 1951 年 3 月李奇微就表示，“如果在三八线实现停战，那就是联军的大胜”。艾奇逊也承认：“我们不能在朝鲜打败中国人，因为他们比我们投入更多的人在那里作战”。布雷德利在 1951 年 5 月 15 日的远东军事形势听证会上明确指出：“与红色中国打有限战争，将会使我们投入过多的力量，增加我们的风险。”即使把战争扩大到中国，也并不能保证朝鲜战争的结束，使中国屈服，相反有可能重蹈日本侵华的覆辙。助理国务卿腊斯克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在中国打仗是无法想象的。虽然美国及其盟国可以动用几十万军队，但至多占领一些沿海城市，却不能把我们的意志强加给那个人口众多的国家。”⁵ 既然不能取得朝鲜战争的胜利，那么停战就成为美国的唯一选择，并促使美国人掂量与红色中国打仗的巨大风险。1953 年 7 月朝鲜停战协定的签订，不仅标志着朝鲜战争的结束，也意味着一个冲突管理机制的建立，为朝鲜半岛乃至东北亚战略格局的长期稳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责任编辑：刘 莉

¹ 石丸和人『戦後日本外交史：米國支配下の日本』東京：三省堂、1983、72- 73頁。

² 池井優『増補日本外交史概説』東京：慶應通信、1982、242- 243頁。

³ 石津朋之『日米戦略思想史』東京：彩流社、2005、196- 197頁。

⁴ 斯蒂芬·范·埃弗拉：《战争的原因》，何曜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第142- 153頁。

⁵ 赵学功：《巨大的转变：战后美国对东亚的政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8- 69頁。